

宋跃华 / 著

佛教与管理学初探



宋跃华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佛教与管理学初探

宋跃华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与管理学初探/宋跃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216 - 05466 - 9

I. 佛…

II. 宋…

III. 佛教—管理—研究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432 号

佛教与管理学初探

宋跃华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9.875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插页:5

版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5 千字

定价:1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466 - 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绪论

- 一、契理契机 1
- 二、研究现状、评述及方法论抉择 10

第一部分 理论篇——缘起人假设

第一章 缘起法对佛学基本理论的统摄

- 第一节 缘起法的缘起 19
 - 一、求道缘由 19
 - 二、灭苦过程 22
- 第二节 缘起法概述 31
 - 一、真理性 32
 - 二、佛法核心 34
 - 三、意蕴 36
 - 四、演化 37
- 第三节 缘起法的发展——以中观缘起为例 39
 - 一、中观缘起与一切法空 41
 - 二、二圣谛 43
 - 三、八不中道 45

第二章 缘起人假设的构成

- 第一节 管理的定义及人性论 48
 - 一、管理的定义 48



二、人性论概述	54
第二节 缘起人特质	56
一、苦类	57
二、苦集	64
第三节 缘起人性论	71
一、缘起人性论的要点	72
二、暗示的管理原则、实证及意义	73

第三章 缘起人假设对西方管理人性论的超越

第一节 穷苦与经济人假设	77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	77
二、经济人假设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的转化与应用	79
三、穷苦与经济人假设	83
第二节 怨憎会苦与社会人假设	85
一、霍桑实验	86
二、社会人假设	88
三、怨憎会苦与社会人假设	90
第三节 求不得苦、乐苦与自我实现人假设	95
一、自我实现人假设	95
二、马斯洛自我实现人的佛学归宿	98
三、求不得苦、乐苦与自我实现人假设	101

第四章 缘起人假设的运用

第一节 管理经典的解读	106
一、文化因素	107
二、社会因素	109
三、个人因素	111
四、心理因素	114
第二节 企业经营要素苦受分析	118

一、员工的苦受	118
二、消费者的苦受	121
三、社会的苦受	125

第二部分 实践篇——“六和”企业文化

第五章 企业文化与“六和”概述

第一节 企业文化	132
一、企业中含有“文化”的因素	133
二、企业文化理论	135
三、企业文化产生的模型	139
四、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概况	143
第二节 六和文化	145
一、企业文化与传统文化	145
二、六和缘起	147
三、共证择灭	152
四、事和	162

第六章 理和同证与使命文化

第一节 企业使命的产生与特性	168
一、企业家的范畴	168
二、企业家苦受分析	173
三、企业使命的产生与特征	178
第二节 理和同证的企业使命	182
一、理和同证	182
二、同证的原因	184

第七章 见和同解与价值观文化

第一节 认知正见	193
一、佛学中的正见	193



二、市场经济中的正见	196
第二节 同解正见	199
一、提婆达多叛教案例分析	199
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207
三、一点说明	215

第八章 利和同均与创新文化

第一节 释尊创新的内容	221
一、制度创新——四姓平等	221
二、思想创新——中道	223
第二节 释尊创新的原则	226
一、法利和敬	226
二、世利同均	231
第三节 利和同均的企业创新	237
一、并购：创新的主要模式	238
二、利和同均的运作原理	242
三、利和同均的并购	244

第九章 三业和敬与行为文化

第一节 佛学业力说	249
一、施設三业	249
二、业因与果报	251
第二节 当前行为文化的过失及原因	255
一、离职的普遍性	255
二、管理层的解释	256
三、员工离职的原因	259
第三节 三业和敬的行为文化	263
一、尊重个人的意和文化	264
二、宏观管理的身和文化	266

三、良好沟通的语和文化	272
结语 以佛学解决企业管理实践的疑难	
一、产生困境的原因	275
二、以佛学指导管理实践	280
主要文献资料	
一、佛学资料	284
二、管理学资料	296
三、宗教与传统文化	304
后记	307

绪 论

一、契理契机

“契理契机”是历代佛教得到发展的规律。所谓“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即在全社会中构成佛教经济及信仰主要资源的群体；其次是佛教的社会功能。所谓“契机”，可解释为“佛教的社会功能满足其社会基础的需求”。在“契理契机”这一规律中，不变的是“契理”，可变的是“契机”。“契机”之所以可变，其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变化，构成佛教经济及信仰资源的群体也将产生变化。佛教界对这一可变之“机”的把握，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佛教发展的起伏跌宕，这一点可以从佛陀时期佛教的昌盛及清末以来佛教的衰落获得证明。

1. 佛陀时期佛教的昌盛

相对于吠陀时代的农牧业社会^①，佛陀时期的印度社会出现了以金属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庞大的商队、借贷频繁、储蓄与

^① 早期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前1000年）以游牧经济为主，晚期吠陀时代（公元前1000—前600年）则以农业经济为主。



投资等活络的商业经济现象^①，商人阶级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七世纪义净赴印时，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录道：

西国时俗，皆以商人为贵，不重农夫。^②

释迦牟尼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社会基础的变化，以商人为重要的经济及信仰资源，契机地传播佛法，满足商人的需要。

(1) 以商人为重要的经济及信仰资源。据《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商人是佛陀最早的皈依弟子。释迦牟尼刚成佛，从菩提树下站起来，即授二位商人三归依：

尔时世尊，咒愿讫已，即便受食，食既毕竟，澡漱洗钵即授商人三归。^③

(2) 满足商人关于社会地位、经商获利的需要。

第一，肯定商人作为职业的如法性。经商是过好世俗生活的正当职业之一：

何等为方便具足，谓善男子种种工巧业处以自营生，谓种田、商贾，或以王事，或以书、疏、算、画。^④

① (1) 金属货币：“尔时东方弗于逮诸王，以金钵盛满银粟，银钵盛满金粟，其往至转轮王所白言，天王来大善，东方诸城国界，宜乐炽盛安隐，五谷丰熟，人民众多，珍宝众多，工巧者饶，明月珠玉琉璃、白象马牛羊奴婢米谷丰饶，仓库储满。”（《大正藏》，第1册，第281.1页）；(2) 商队：“二城中间道侧树下静默而坐，时有五百乘车经过其边，车声轰轰觉而不闻。”（《大正藏》，第1册，第19.1页）(3) 借贷“若有欲人贫穷，举贷他家财物，世中举贷他家财物为大苦耶……若有欲人举贷财物，不得时还曰长息，世中长息为大苦耶……若有欲人长息不还，财主责索，世中财主责索为大苦耶……若有欲人财主责索，不能得偿，财主教往至彼求索，世中财主数往至彼求索为大苦耶……若有欲人，财主数往至彼，求索彼故不还，便为财主之所收缚，世中为财主收缚为大苦耶……彼虽多有金银琉璃水精摩尼白珂螺壁珊瑚琥珀玛瑙玳瑁碎碾碧玉赤石斑珠，然彼故贫穷无有力势”（《大正藏》，第1册，第614.1页）；(4) 储蓄与投资：“后求财物已，分别作四分：一分作饮食，一分作田业，一分举藏置，急时赴所须，耕作商人给，一分出息利。”（《大正藏》，第1册，第642.1页）

②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大正藏》第54册，第230.1页。

③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3，《大正藏》册3，第642.2~643.3页。

④ 《杂阿含经》·卷4，《大正藏》第2册，第23.1~23.2页。

第二，在教内提倡“四姓平等”，满足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产生的种姓平等的需求：

我法中有四种姓，于我法中作沙门，不录前名，更作餘字，犹如彼海，四大江河皆投于海而同一味。^①

第三，佛陀禁止僧众与商人争利，将不可经商求利定为比丘、比丘尼所受持具足戒之一，五篇罪之一的尼萨耆波逸提：

若比丘尼种种贩卖求利，尼萨耆波逸提；若比丘尼以金银及钱种种卖买，尼萨耆波逸提。^②

第四，指导商人如法求财。首先，为商人的经营活动设立了伦理规范。佛陀在《善生经》中说明了六种非法求财的方式：戏求财物、非时行求财物、饮酒放逸求财物、亲近恶知识求财物、常喜妓乐求财物、懒惰求财物者为非法^③，否则，“未得财物则不能得，本有财物便转消耗”^④。其次，为商人提供经营技巧，如：“货卖速售，大得财利”^⑤、“贩卖市易，教令依平，无贪小利，共相中欺”^⑥。

佛陀之契机说法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使佛教即使在当时各派思想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从佛教发展的物质基础看，商人阶层是古印度各社会阶层中最积极、数量最多的财施者；从佛教的对外传播看，其新的传播区域必然是商人们曾经开拓的市场，《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三记载：

若复苾刍与苾刍尼共商旅期行者……若无商旅不能得去。^⑦

① 《增壹阿含经》·卷37，《大正藏》册2，第753.1页。

② 《五分律》·卷12，《大正藏》第22册，第83.3页。

③ 《中阿含经》·卷33，《大正藏》第1册，第639.2页。

④ 《中阿含经》·卷33，《大正藏》第1册，第639.2~640.1页。

⑤ 《中阿含经》·卷60，《大正藏》第1册，第802.1页。

⑥ 《优婆塞戒经》·卷5，《大正藏》第24册，第1061页。

⑦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33，《大正藏》第33册，第807.1页。



即古印度商人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为佛教传播开辟了新地域。

2. 清末以来佛教的衰落

近代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在于佛教界的主流面对已经发生巨大变更的社会基础，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调整其社会功能以满足其经济及信仰资源的需求。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外交通的便利，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市民阶层的壮大，随着传统士大夫逐步转化为近代知识份子，主要在沿江沿海的城镇中涌现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① 这股新兴力量的产生且不断发展，加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督教等“外道”、科学及无神论等新思潮的挑战，导致中国佛教社会基础发生了改变：

随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解体，清末重心在农村的传统佛教的社会基础也趋于瓦解，导致了信仰更加薄弱等种种弊端，表明传统的山林化鬼神化的宗教趋向已站不住脚了。另一方面，沿海沿江城镇及其居民，如工商业者、市民、开明官僚等却表现出对佛教越来越大的影响力。^②

面对改变了的社会基础，佛教界没有适时调整其社会功能以满足工商业者、市民、开明官僚等群体的需求。原因有三：首先是僧众的素质与能力问题：

民国时期，据统计汉地僧尼人数虽有七十万众之多，但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其中不少是因贫困、战乱、天灾人祸等原因走投无路而遁入佛门。据印光法师说，当时僧尼不识字者占80%以上，这些文盲僧尼，连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尚且未曾受过，更不用说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了，即佛学的基本原理，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②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吃不透者亦占多数，出家多年而不会背“楞严咒”者亦非少数，应答时代挑战、革新教理教制的重任，盖非他们所能承担得起。^①

其次是僧众的意愿问题，陈荣捷在《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中，论述民国以来中国佛教衰微的情形时说：

中国和尚与尼姑的主要职业是在丧葬等场合诵经作法事，通常他们是藉此而获得报酬。我们无法逃避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僧伽乃是无知与自私等乌合之众的团体……产生这种可悲情形的原因，在于加入僧伽的那些人的典型……他们的“剃发”很少是因为信仰。他们“遁入空门”，为的只是贫穷、疾病、父母的奉献，或者在祈求病愈或消灾祈福时承诺将孩子送入寺庙、家庭破碎等，有的甚至是因为犯罪。^②

此外，佛教的传统社会功能趋于削弱或变异：

不事奢摩静虑，而唯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属累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缁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③

惟一得到加强的是“荐死超生”。

3. 当代佛教发展的“契机”

陈兵、邓子美两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中对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作出如下描述：

信仰佛教，特别是出家，在人们眼里依然被认为是人生挫折的逃避或老年的寄托。许多佛教徒在社会上仍然挺不起腰。尽管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作出了很大努力以改变整体形象，但奏效不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② 陈荣捷著，廖世德译：《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5页。

③ 章太炎、曼殊：《敬告十方佛弟子启》，马以君编注，《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大，以致造成中国社会与佛教状况变化的强烈反差。其原因虽多，主要的恐怕仍是佛教主导层对社会已产生与将产生的变动缺乏清醒的认识，未自觉地适应协调。^①

在下文中我们将之与当代佛教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相结合，说明当代佛教的应如何“契机”发展。

“视信仰佛教乃至出家为人生挫折的逃避或老年的寄托”，说明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以来，佛教主导层没有依据社会环境及政策的变迁而主动调整其社会基础。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虽然在民国时期，工商业者、市民及开明官员已经成为佛教主要的经济及信仰资源，但这一切，包括佛教本身在文革时期都遭到灭顶之灾。唯有在运动开展的并不彻底的偏远山区间或存在，因此当时佛教的经济与信仰资源也只能来自于此类地区。第二，劫后重兴的佛教，青黄不接，人才断层长达二十余年，各大寺院基本上由五十年代以前培养出来的高僧主持，此时他们与那些在文革中幸存且坚定信仰的居士一起开始进入暮年。第三，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使整个世俗社会基本上围绕着经济进行运转。在市场经济中，处于事业发展和拼搏阶段的人们，沉醉于物质利益及其追逐的过程，没有时间与精力关注个人的精神利益。反之，处于事业低谷，遭受挫折的人则有可能从佛教中获得心灵的抚慰。

改变这一形象的关键于以企业人员为佛教的经济及信仰的基础资源。市场经济中，全社会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企业则是经济运转的载体，其人员（包括企业主、管理人员及基层员工）在数量上构成了都市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作用上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企业人员虽作为近三十年来形成的新兴力量，实是都市社会乃至全社会的主流力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量。不进则退的市场经济使企业人员形成了积极进取的特点，因此，若以企业人员为其社会基础，佛教可改变其“人生挫折的逃避或老年的寄托”的形象。

佛教如何才能获得企业人员的认同，进而使之成为经济、信仰的资源？无疑，沟通是第一步。然而，作为佛教发展主力的僧众与企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存在先天的障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沟通的途径看：企业人员接触佛教大体有两个途径，一是利用休假的时间，以寺庙作为旅游景点；二是利用书籍了解佛教。现实中，两种途径都非有效途径：前者在于企业人员由于缺乏基本的佛教知识而无法从直观的佛寺建筑中体会佛教的内涵（笔者曾在文殊院听一导游将弥勒佛解释为阿弥陀佛，而游客中却无人提出异议）。后者的障碍在于几十年来的教育模式，使人们对佛教经典的阅读产生畏惧。第二、从沟通的内容看：人们对佛教文化的理解离不开身处的时代背景所特有的心智，绝大多数企业人员成长并生活于无神论、商品经济的氛围中，因此佛教三世因果等无法被自然科学所实证的理论被视为无稽之谈；空、苦等理念被视为与竞争、自我实现相背道而驰的颓废的人生观。第三、从沟通的双方看：企业人员关注的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职业安全与发展，涉及的必然是企业管理的理论及实践模式；僧众由于自身素质及生活环境的缘故，大多缺乏基本的管理理论及实践经验，使之在与企业人员沟通中无法实现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主旨。^①

综合上述三方面形成障碍沟通的原因，可以得出结论：要实

^① “在舆论宣传中，往往片面理解‘人间佛教’的口号，强调佛教去适应世俗生活，而佛教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主旨却有所忽略。”（王雷泉：《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佛学研究》，1996 年刊）



现企业人员与佛教的沟通，从佛教的角度看，就需要将企业管理的理论及实践模式纳入佛教的体系，以佛教的理论来剖析企业经营的发展得失、引导企业人员在残酷竞争的职场上获得职业安全乃至发展。而且在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过程中尽量以缘起等人文理念替代鬼、地狱等非人文内容。2005年9月上海玉佛寺的十八位僧人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MBA课程可以说是佛教界建立与企业人员沟通基础的积极行为。

使企业人员成为佛教社会基础的第二步是调整佛教的社会功能，满足企业人员的需要。在当代，佛教界人士所作的种种努力仍然是传统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伦理教化三大功能。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社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伦理教化等需要的根源与传统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佛教界实施这些功能模式却是没有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佛教界没有从产生这些社会需求的根源上努力，因而，其努力的效果甚微，以至于“尽管中国佛教界有识之士作出了很大努力以改变整体形象，但奏效不大”。杨惠南在1994年佛光山主办的“佛教现代化研讨会”会上，以环境保护为例直指当代佛教社会功能的无效性：

生态的污染和破坏，主要来自资本家及与资本家相互勾结的政府（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在海南、云南大规模毁林行径——笔者注）。家庭垃圾的污染，一两栋树的遭到砍伐，其对生态的破坏，比起大工厂的排放污水和有毒气体，乃至倾倒重金属废料的污染、破坏，可谓微乎其微。当代台湾佛教（如证严法师和圣严法师所主导的）环保运动，专挑这些微乎其微的环保工作来做，在保守的佛教界，固然已经难能可贵，值得赞叹，然而，毕竟还是值得反省、针砭的事情。^①

^① 杨惠南：《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佛光大学筹备处主办《佛教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1994年10月。

至于社会对伦理教化、福利社会的需要，同样也是起因于企业运作。以慈善为主的社会福利事业，是由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弱势群体主要由残疾人士及长期失业而经济窘迫人员所组成。国家通过税收来援助弱势群体，税收的主要来源是企业税收及企业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发展，一方面减少了社会弱势群体的数量（既减少失业人数），另一方面为国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提供财源。社会之所以有伦理教化的需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伦理道德有着普遍沦丧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充斥整个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原本是大自然不同物种之间的进化竞争却被用以同一物种（人类）乃至同一团体成员之间的竞争，人们为了职业的安全与发展，在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

社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伦理教化，不仅是社会的需要，更是企业人员的需要。社会福利事业，关系到企业人员失业、退休后的生活保证；环境保护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企业人员可否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伦理教化则关系到企业中每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心境及合作问题，即个人效绩问题，从长远来说关系到企业人员的职业安全及发展问题。

总之，在当代，佛教界要实现三大社会功能，势必介入具体的企业管理之中，即将企业管理纳入佛学体系，进而以之批判企业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缺乏慈善等社会责任、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恶劣等现实，在此基础上，化世导俗，提供降低污染、提升社会责任、改善工作伦理的方法。

综合上述分析，佛教要在当代得到发展，实现其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主旨，改变其“人生挫折的逃避或老年的寄托”的形象，首先要通过沟通使企业人员成为佛教的社会基础，其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实施社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伦理教化三大功能。这样一来，佛教就不得不将企业管理纳入自己的体系。